

# 张晓风：赤子之心 白瓷之泽

□王 茹

初识中国台湾作家张晓风,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大约1990年前后,上中学的我偶尔买到了一本散文集,里面有张晓风、席慕蓉等名家的散文。张晓风的文字纯净而又明亮,如同她的名字,一缕柔和的春风迎面而来,读起来温润亲切,对于时或怀有迷茫与痛苦的个体,又如同一剂疗心的良药,读之即可平复心情,治愈心伤。

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作家本人,那一年她72岁。张晓风应邀来福州,在三坊七巷安民巷“八闽书院”作了一场讲演。她娓娓道来,讲文学谈人生。张晓风顺手给大家看她的旅行袋,那是由一些牛仔布块拼接而成的。她说这个旅行袋跟随她很久了,已经有点破损,但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之后还是可以用了。当时我暗暗赞叹这位知名作家的朴素本色和环保意识,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惜物爱物之心,才能写出那篇篇锦绣文章?

2019年,临近岁末,张晓风又到福州。这次,我对张晓风的人和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时隔六年,张晓风再次在“八闽书院”开讲。讲堂不大,但座无虚席,文学爱好者们闻风而来。张晓风老师走进了讲堂,她上身穿了一件黄绿色的夹克衫,围着同色系的丝巾,下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从这穿戴中看得出,虽已年近八旬,她仍葆有爱美之心;虽是料峭冬日,却把春天的颜色披在身上。只是,这回手里多了一根拐杖。

张晓风作了题为《因为……所以……》的讲座,谈到各种有趣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因果句子。张晓风在台岛已定居多年,不过从她讲座的话语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对祖国大陆的眷恋和身为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她的“中国心”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有任何改变。七十多年过去了,她依然深情回忆起自己一岁多时,为逃避战乱,被父母带到福建建阳,常常躺在床上睁着大眼睛看屋顶的情形。中国情怀和中国文字,是刻在她骨子里,流淌在她血脉中的。她博学强识,论述学理时频频举例说明和阐释,古典,现代,佳作佳句信手拈来。提及朱自清的《背影》,晓风老师谈起了其中一种重要的食物——桔子。中国是桔子的原产地之一,拥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屈原咏物诗《九章·橘颂》,寄寓对于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向往与坚守,闻名遐迩。据载,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咏物诗,赞颂的并非宏大事物,而是细微之物,即由桔子开始。

张晓风讲述,在所有送别的食物中,桔子是最好的,也是最方便的,因为桔子不需清洗,带在身边,想吃随时就可以剥开来吃,很干净,又美味又解渴。解读清晰明了,通俗易懂,通过其讲解,读者们更为深切地体会到朱自清的父亲的良好用心。张晓风由此还联想到福桔,称赞福桔的美味。诚然,桔子由楚地远运而来,但经年累月,便已在福州开花结果了。清朝施鸿保所著《闽杂记》中就记述了福州城外“广数十亩,皆种柑桔”。细细品味中国文化的种种精髓,处处悉心观察身边的琐碎小事,进而清晰地表述给读者,张晓风对于中国文化的挚爱,是用“解释”的方式体现的。

张晓风喜欢解释,在文章中,她写道:“解释,这件事真令我入迷。”不仅在写作中,也在平日的讲课当中,她把自己对天地万物的阐释和解读,细致入微地呈现

给读者和观众。楼肇明评析张晓风的散文:“生命和生存本体论的诗性阐释,是这位女作家奉献给现代散文史的最大功绩。”她的阐释和解读,是具有诗意的,使原本无情的物品,如桔子,也赋予了丰富的情感。

两天后,一早,赶在张晓风赴福建师大讲座之前,我们径直往酒店看望她。那天,张晓风穿了一件深咖色的毛衣,毛衣上点缀着几朵粉嫩的小花。她围了一条黑色的围巾,上面也绣满了精美的花朵,下面搭配黑裙子,整体色彩非常温和而且协调。我注意到78岁的她还抹了一点口红,看上去又端庄又精神。

我向她提问:“您现在写文章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写呢?”她说:“我还是用笔在写作,“之后她又补充说:“我舍不得不写字啊。”看似简单的话语,却让人不由感到震撼,在她心中,那个一个方方正正的中国文字有着无穷无尽的魅力!十多年前,在一次访谈中她也曾说过:“白纸黑字的东西,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有影响力的东西。尤其中文,它的那个优美会让我真的很感动,到现在来说,中文中的每个字,对我来说,都还是非常具有美感的。”她已用中文写了数十年,讲了数十年,终是割舍不了这令人痴迷的文字。

短短几日后,作家返回台湾去了。不过,她的新作《花树下,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下称《花树下》)却留在我的手中。《花树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该书作品多写于她70岁后,文风一如往昔清新温润,但内容则更加丰盈厚实,是拥有七十载人生阅历后的沉淀之作。

开篇的序,题目即书名,副题是:“——风雨并肩处,记得岁岁看花人。”序文很简约,写的是台北城南有一棵会开花的树,张晓风每年春天都会特地去探望它。这一年去看花树的时候,细雨霏霏,一位女子把伞送给了淋雨看花的张晓风。雨中赏花,本就是件浪漫的事,张晓风爱花,爱美,爱世界,做起这件事来自然而然,而这位赠伞的女子,大约也是爱花的人。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都是花下的一时过客,都为一树的花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风雨并肩处,记得岁岁看花人”……我因手巾撑伞,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儿,才对不起赠伞人。此时,薄暮初临,花瓣纷落,细雪微度。环顾四周,来者自来,去者自去,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在同一个春天。我想,我因而还能再站一会儿,在暮春的花树下。

这段话虽简短却大有深意,发人深省,这不仅仅是看花,更是在看世界,看人生。乍看仅是片刻间的生活场景,细品却是作者一生过往的回顾与感悟,甚至融入哲学式的思考。那棵大树就仿佛是这个世界,世上人来了,又去了,而有缘的人们不经意间在同一个时空里

## 华文文学



相逢,一同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妙。正因为世间有这样如黄昏、如花瓣、如细香的种种美好,才支撑着人们坚强地站在这个有风有雨的世界中,更是因为世间众人的相互扶持与关爱,才能让我们在风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这段文字,仅看字面之意已觉有趣,而内中蕴含的深意更是醇厚的人生哲理,也是她七十多年人生阅历的精华凝练。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热爱,张晓风从文学家特有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地理文化。《山事》一文,开头有段话:“从成都出发,我们走过司马相如的‘琴挑’,停伫过薛涛枇杷深巷中那飘晒着水红色小条笺的院落,绕过苏东坡竹簾丛生的眉山故里,我们往西方的仙子寄住的山区走去。”如同饕餮眼中有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文人心目里则是文学中的中国。踏访无数次的作品中读到的地名,一个个历史人物,仿佛都复活了。中国文学家在,则中国文学就在。这篇散文题为《山事》,关于中国的“山”,她一口气列举出许多种。也许以普通人看来,山不过是高低大小之分而已,没想到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山不仅是有性格的,还是有深度的,甚至是有尊严的,山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生命”。张晓风解读和诠释的这些“山”,多数人不甚了然。难怪张晓风说“舍不得不写字”,当一个个熟悉中国的方块字在她笔下显现并排列组合时,她定然如庖丁手执解牛刀一般轻松而愉悦,又仿佛一位大厨用中国文字这种可爱的材料为读者制作一道又一道精神佳肴。

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评价:“张晓风不愧是第三代散文家腕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这支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抚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余光中《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山事》就完全体现了“亦秀亦豪的健笔”。前文才写“春来山事好”,用秀雅的文字细细描述春山的妩媚,后面就为作家们代言,改写了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文行海内兮归故土  
愿得天下健笔兮共写四方

## 以期刊为路径 重估香港文学

——“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重大课题研讨会综述 □安 然

与《圆桌》比较,呈现香港诗坛风貌。中国矿大朱云霞副教授析校园刊物《五四文刊》,进而思考当代香港文学转型问题。许婉霓博士生以《炉峰文艺》为中心,考察左翼团体“炉峰雅集”在1997年之后的表现,剖析内地与香港当代左翼文学发展的差异。楚雄师院洪丽霁副教授、暨南大学易淑琼副教授、江苏师大宋红岭副教授、江苏师大周文晓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韦鑫等有关《诗双月刊》《新思潮》《字花》等的文章,皆能对一手资料进行细致的整合分析,符合项目的核心诉求。

课题组格外注重搜集稀见期刊,探究其历史意义,中国传媒大学乐琦教授关注的《新东亚》即为很少受人关注的刊物,该刊足以呈现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区与其它沦陷区的不同之处。

香港特殊的地域文化经验,深刻影响到文艺期刊的表现,当地文艺期刊既是展示内地及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学成就的窗口,又是沟通海内外文学的桥梁。江苏师大王艳芳教授聚焦《南洋

文艺》,通过其文艺表达彰显香港对南洋的文化影响,展示“香港—南洋”文化交流的印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汤倩副研究员客观评价《文学村》的世界性,充分肯定其在中心与边缘间坚守文学的意义。广西大学赵牧教授、河北社科院文学所张越、华南师大徐诗颖博士等对《博益月刊》《文学世纪》等的研究,亦充分考虑到香港期刊之于海内外文学交流的意义。

探索“本土性”是当代香港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与会学者以全面掌握原始文献为起点,重申“本土化”及相关问题。华侨大学陈庆妃教授着眼于《大拇指》《素叶文学》对内地新时期文学的回应,指出刊物在新时期期的文学实践与其呈现“本土化”,不如说呈现“本地生活”,应将香港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加以评价。暨南大学博士生张嘉茵从《呼吸诗刊》入手,诠释辩证的“本土”。“南来”与“本土”互为参照,浙江财经大学操乐鹏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讲师邓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李青林对《大风》《文艺阵地》等的研究,以南来文人在港的办刊实践为中心,展现抗战时期“内地—香港”的文化互动,不同程度地涉及香港文学主体性的问题。

唐弢先生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即力求尽量以原始期刊为依据,课题组秉承紧扣一手材料的传统,深入原始文献,返回文学现场,探寻香港文学发展实际与现有文学史书写的脱嵌之处。一般认为,现代香港与内地文学发展有“滞差”,部分与会学者将其归因于内地、香港文人在审视香港文学时存在“视差”,并尝试以此为切口,推进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更新,这一倾向在一组研究现代期刊的论文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惠州学院颜敏敏教授认为《双声》的文学实践开启了香港现代小说的种种可能;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芳博士考察

《岛上》作者的身份自觉与文艺接受史;中国社科院大学刘月悦博士藉《新命》探讨“岛上社”以外的1930年代香港新文学;曲阜师大徐婷博士以《墨花》为线索,探讨生产文学现代转型容摄性逻辑的可能性。论文从不同侧面表现香港与内地文学的差异,或依据原刊资料补足现有的文学史,或为现代香港文学研究提供新角度。

赵稀方研究员在学术总结中先是关注了香港报刊研究的理论问题,即强调“以香港报刊作为方法”。他指出,以往的香港文学史把香港文学看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附属,这些史著的作者一般是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学者,通常按内地文学史的叙述方式来演绎,认为香港与内地的文学存在一种“滞差”,如,称香港新文学落后内地20年,“时间滞差”其实是一个理论概念,这种有关“时间滞差”的表述,恰恰体现了内地现代文学叙述的局限性、文学现代转型的矛盾性和未完成性。香港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不过,香港沦为殖民地后,其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内地存在差异,香港文学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特征。透过香港文学这一他者,可以让我们反省内地新文学的问题。他强调,文艺期刊是香港文学研究重要的原始资料来源,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香港报刊研究首先在对象方面即具有原创性,“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重在搜集、整理一手文献,以此为起点推进相关研究。在爬梳原刊文献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弥补现代文学研究的缺陷,并上升为不同的理论命题。赵稀方研究员对主题发言进行评点,并且侧重讨论以下问题:一是“香港—南洋”的关系;二是1950年代初左翼文人北上与绿背文化区之间的空档时期香港文坛的情况;三是如何以《五四文刊》为切口,讨论香港如何处理文化传统的问题。

我和宇秀仅在2014年秋季在南昌举办的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见过面,那时我知道她是已经定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女诗人。这几年常在网上读到她的诗,开始,只是一般浏览,后来,就被震撼,感觉她不是那种满街游走如过江之鲫般的诗人,她的诗心诗感常散发着海角般的寂寞、黄昏样的惆怅、深谷幽壑般的深沉……近日看到她在《小说月报》2023年首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永福里》,诗人写小说,不能不赶紧找来先睹为快了。

小说主体事件极为平常,关于苏州永福里的变迁。一家一户、一城一地的变迁几乎成了永恒题材,许多人已经写过,写不出特色就很不易讨好。宇秀却偏偏要写,因为那里的弄堂房舍、光影气味、吴依声韵、世俗俚语、窸窣窣窣叽叽喳喳的声响都伴随着她的出生、成长,深深刻印在她的魂魄里。当她在几万里之遥从纽约微茫而不是真实确凿的证据里,听到这一切已经被岁月磨蚀得不再存在时,她不能不呼不悼。但读完全篇发现,怀旧与乡愁并非是作者意图所在,小说在缭绕的人间烟火气里隐含着一份人间无可挽回的悲凉,那种超越具体一条弄堂、一座城池、一块土地的有关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悖论,那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的消解和消逝。小说设置了复调的叙事线索:一条是以王老太和聋彭阿婆为主的老一辈永福里人,另一条是以阿胖哥、表哥和露丝玛丽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两条线索交织穿插,在不长的篇幅里勾画了永福里漫长岁月里的社会变迁和风流云散的人物命运。

圣诞前夕,刚移民温哥华又身怀有孕的露丝玛丽天天倚在自家窗前,像电影的推拉镜头般望着窗外“仍有绿意”的草地和草地上面的人影,那不是一般的望,而是望眼欲穿:她在等待亲友们的圣诞卡或回信,因为半个月前,她曾给国内亲友们寄了一大沓贺卡,特别是寄给曾经是永福里邻居的阿胖哥的贺卡,因为里面还夹了封信。她不想看电脑上的回复,她巴望的是从前那种“真正手写的、贴了邮票寄来的问候”,因为那才是原汁原味来自故乡的有质感的惦记和问候,而她期待阿胖哥的并不止于一个礼节性的回复。终于她看到那个天天盼着的穿着短裤和大头靴的邮差。随着意识的跳荡,那位过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永福里、“穿着墨绿色制服”的邮差,以及那邮差带出的永福里的人和事和那些远去的时光电影般闪回映现在她的前面:王老太一家,聋彭阿婆一家,阿胖及阿胖姆妈、阿胖外婆,大块头,表哥,薄嘴唇女人,聋彭阿婆家的花猫,以及后来陆续搬入7号的临时住户……

有人就有氛围有矛盾有故事:每月初,随着邮差站在6号门前高喊一声,从阿胖姆妈、阿胖外婆到聋彭阿婆到左邻右舍立即一个个跨出门槛,在羡慕、忌妒、仰望的神情中,人们常是不约而同地高声催促“快点,快点,阿玉寄钞票来了!”这时,胖墩墩的王老太便一叠声地应声奔出,递上老头的图章,喜滋滋接过儿子寄来的汇款单,一阵因远方汇款引出的羡慕声和同长问短声就随着涌到她身边邻居们升腾起来,在人影与人声中,特别有面子的王老太显得更加得意。不过,也不总是这么和谐,紧挨着王老太的隔壁邻居聋彭阿婆的羡慕里多少有点酸楚,可安慰者只有自家那只花猫。可花猫发情时日夜啼叫,还踩碎了王老太家屋顶上的两块瓦,王老太不由得咒骂,尽管耳聋的聋彭阿婆并未听到,可从王老太的嘴的动作中她还是猜到了她的咒骂,更巧的是,几天后,那花猫突然死去。聋彭阿婆虽无证据,却确凿地怀疑就是王老太毒死了她的宠物!于是万怨合一,她不顾一切地同王老太吵起来!幸亏她们各自的老头胸襟开阔,明事明理,化解了一场即将燃爆的大战!最为惊心动魄的是永福里人们的陆续搬离,它惊心动魄,却无声势,而是阴风般徐徐吹来的劫走永福里过往一切的灵魂:从一只猫的猝死开始,先是老来无依的聋彭阿婆夫妻俩被侄子“接走养老”,后是永福里不少人家的陆续搬迁,最后是死了老头再无支撑的王老太被女儿、外孙强行拉走,以便外孙以旧宅换新楼、满足外孙未婚妻嫁过来的条件。没过几年,从前那个烟火气十足、邻里间一边吵嚷一边相帮、既争斗又和谐的苏州弄堂从人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霓虹灯……更可悲的是承载永福里一切故事的王老太和聋彭阿婆20多年间从争吵到嫉羨到惜别到思念,终归双双死亡,再未相见,连王老太心心念念寄给聋彭阿婆的十元大钞也再无回音。

毕竟是诗人写小说,宇秀不同于此类题材通常采用的线性结构即以时序为线、随着矛盾冲突的展开娓娓道来,她采取的是块状结构,以意识的流动拖出一块块生活的流动,在生活的流动中集中展示生活的流变,在意识的流动中倾诉失去、远离、永不回来的惆怅和乡情。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只用几幅画面几种氛围的营造,就烘托出一亲热一冷漠、一扎堆取暖一抗拒疏离的时代变化、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

在人物塑造上也一样,作者往往拂去语言、动作,而是以诗意的感觉和细节凸显人物形象,如在王老太与聋彭阿婆因花猫突然死亡而大吵一架后,虽也冷战过一时,但并未从此不相往来,王老太的小孙女也就是后来的露丝玛丽还是照样偷偷往7号院里跑,聋彭阿婆也照样为她梳小辫儿,而且总是感叹说:“王师母,福气哟!”又过一些日子,王老太早已和聋彭阿婆摒弃前嫌,俩人每早都亲亲热热同去小菜场买菜,在王老太的“公关”下,聋彭阿婆的菜篮也更丰富更添花色了。如果说这些细节描绘出了她们的和气善良本色,那么,另一细节更烘托出她们令人心疼的可怜卑微:聋彭阿婆决定搬往侄子家后,在收拾东西时拎出个奖状大小的镜框到门外,当她掸去上面的尘土后,里面照片显现出来,“大概聋彭阿婆的一生都浓缩在这一尺多见方的框子里了”。小说写的是两位老去的性格命运,又何尝不是永福里这块土壤、文化和由此孕育出人们的性格命运!

代表着永福里老一辈的王老太和聋彭阿婆善良又温厚,可爱又可卑,滋养她们又由她们营造出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情味浓稠得让人不忍离去,但卑微的现实却又不能不使他们的代代后人走出这片“温柔乡”:从儿子辈的阿玉,到孙子辈的表哥、阿胖哥,乃至心心念念思念它不止的露丝玛丽……这是残酷的,却又是不能不失去的——因为时代在变,人们的文化观念、梦想追求在变。他们得到的是已经实现或正在追逐的梦想,失去的却是来时路上哺育他们成长的原乡文化。随着永福里及其王老太、聋彭阿婆们的逝去,各奔东西的永福里晚辈成了失去来处的一代,这种失去固然首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大势所趋,而人为的抛弃、切割和遗忘,则成为作家的思考和文学里的挽歌。

小说里的阿胖哥、表哥等后代这条线索虽着墨并不多,以散点连接出一条辅线,却贯穿始终,跨越时空,从上世纪60年代邮差出现在永福里,直到当下的疫情时代,使故事富有立体感和张力,更重要的是突破写乡愁的表层意义:一种永福里所代表的传统文明及其古道热肠人际关系的一去不复返。尽管有人,比如露丝玛丽,还极力想挽回永福里的种种抽象存在,但终究连阿胖哥也不知所踪。小说里阿胖哥究竟是被疫情卷走了呢,还是他有意回避或切断与永福里这个他的父辈和他自己的生命来处的联系?小说留下了空白。这个空白是对过去的怅然,也是对未来的迷惘。

在絮絮叨叨不惜笔墨地描绘永福里的人情世故烟火气之外,作者最用心的一笔是露丝玛丽对阿胖哥音讯的期盼,所以将这种期盼和悲哀置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不光是因为他们曾在那个绵绵细雨中有过缠绵暧昧的一段相伴,更因为露丝玛丽已将阿胖哥看作是永福里真实存在过的最后一个标志。其实,这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永久悖论,试想,当19世纪的人们第一次坐在借助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风驰电掣地飞驰的火车上时,或许也是一面享受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一面怀念赶着牛车边欣赏路旁野花边悠然行路的从容,就如今天的人们,一面怀念手写书信时代倾诉与倾听的温馨与惦记,一面又要享受电邮与微信的方便快捷。残酷的是,尽管人们对失去的过往流连忘返,却还是或义无反顾或凄凄切切地选择了现代和未来,犹如表哥、阿胖哥,包括露丝玛丽自己,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喜耶?悲耶?说不清,却是文学要书写探索的有趣命题。

小说里写到搬迁,也就写到了旧城改造,其实是现代中国高速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旧城改造就带出人情的变故,如后来的胖阿哥和表哥他们的变化。细想一下,今天人们对往日人间烟火的留恋,实际上并非是对设施简陋的老房子、对居住环境拥挤的弄堂的留恋,而是对那里面的浓浓人情的眷恋。从王老太在永福里住着老宅的正屋,到新公寓被迫迁天井里搭出的棚屋,从红木雕花大床到一翻身就跌落到地上的简陋小床,王老太在永福里前后的生存状态的变化,透出了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中人情淡忘、亲情冷漠的悲凉一幕。小说《永福里》的贡献就在于它不以不长的篇幅、以诗意的感觉和笔触,写出了这种难以名状的挽歌文化和冷峻的哲思。

大约30年前,我的一位老友俞捷先生经过长时间的阅读和研究,曾写过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24美》,书出后,反响颇佳,我于是曾玩笑说,你能保证除了这24美之外,就再没其他小说之美了吗?他对我笑而未答。今天,对应宇秀的小说《永福里》,我除了在俞版《小说24美》中找到可对应的“氤氲之美”外,以为还应加上氤氲托出的哲理之美。

## 氤氲中的哲理之美

——读宇秀小说《永福里》

□李硕儒



加拿大华裔艺术家王俊杰作品